

## 儒学十题

曾 庄

**摘 要:**20世纪两次全盘否定孔子,否定儒学是错误的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,开始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,这对弘扬传统文化很有意义。但凡事有度,过犹不及。近年来的有些提法,似乎都有褒扬过度之嫌。在“儒学热”的当下,正确认识孔子是相当必要的,孔孟之道未必是中国文化的“规矩准绳”,而儒者中亦有“君子儒”、“小人儒”之分,中国历代帝王从未真正“独尊儒术”,历代的法家人物亦多以儒学为招牌,篡权夺位者亦多以儒学粉饰,凡此种种,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上的儒学和儒者,实事求是地直面“中国需要儒学吗”等问题。

**关键词:**孔孟之道;独尊儒术;中国文化的多样性

### 一、从任继愈“颇感忧虑”说起

2010年3月19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王蒙的《纪念任继愈先生》,文章说:“任老对于儒学治国的类似说法颇感忧虑,他甚至于觉得有些意见不太好提。我听了,有震动感。头两月,我参加他主持的文津图书奖典礼,我注意了,获奖的书中有李零教授的《丧家狗》,这是一本比较客观地谈孔子、谈儒学的书,只有愚昧的网虫们才一看书名便向李教授发出狗血喷头式的鼓噪。”看来任老和王老对目前的儒学热都有些不以为然,甚至“颇感忧虑”。

在上世纪,孔子两次成为被批判的对象,五四运动提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;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,孔子又成为被痛打的“落水狗”。自1980年代起,拨乱反正,重新评价孔子,为他开各种研讨会,举行各种祭祀大典,争编《儒藏》。这是好事,对弘扬传统文化很有意义。但褒扬过头与批判过头一样,都难免令人生疑。现在有些人所宣扬的孔子,是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吗?他们所宣扬的儒学,是真儒学吗?有人说是孔子和儒学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存、发展和繁衍,没有这份珍贵遗产,我们就会重过“从人到猿”的生活。这实际上是宋人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长如夜”<sup>①</sup>的现代版,好像没有孔子,中国人白天都只有打着灯笼才能走路。据说,“第一届儒学国际研讨会”发表了《吉隆坡宣言》,提出“正式启动”“以儒学救世”。儒学如果真能“救世”,至少中国不需要“救”了,因为两千多年前中国早已被“救”过了。但事实是,孔子生前东奔西走,周游列国,未能救世;孔子死后,历代“独尊儒术”的帝王及孔孟之徒,也没有能够救世。这都是一些过分溢美之词,不符合历史实际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写太虚幻境有一幅对联: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此联可作各种不同理解,我的理解是:把“假”的说成“真”的,人们怕受骗上当,就会把“真”的也认为是“假”的;把“无”说成“有”,“无中生有”,人们怕受骗上当,就会把真实的存在(“有”)也会当作不存在(“无”)。上、下联的前半句,以“假作真”,以“无为有”,揭露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假货充斥的现象;后半句“真亦假”、“有还无”,揭示了它的严重后果:“真亦假”,没有人相信“真”了;“有还无”,没有人再相信“有”了。这

作者简介:曾 庄,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(四川成都 610064)。

① 胡仔: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四引《唐子西语录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62年,第367页。

恐怕就是任、王二老“颇感忧虑”的原因吧。因此，为了维护“真”，就必须识破“假”；为了维护“真孔学”、“真儒学”，就必须识破“假孔学”、“假儒学”、“假道学”。

## 二、真假孔子

历史上的真孔子与中国历代多数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区别。据《论语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等书所载(本节引文凡未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三书)，孔子是孤儿，“生三岁而梁纥(父)死”。年轻的母亲成了寡妇，家庭贫寒，只能以粥糊口。孔子自称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可见贫寒反使孔子“多能”。后来他做过鲁国的“委吏”(主管仓库之吏)、“乘田”(管理畜牧之吏)，“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。

《论语·颜渊》载：“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曰：‘如杀无道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’孔子对曰：‘子为政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’”直至今日，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也未废除死刑，而在两千五百多年前，孔子连“杀无道以就有道”也是反对的，可见其思想之先进。但“昔孔子治鲁。七日诛少正卯”<sup>①</sup>，这位口口声声说“为政焉用杀”的儒家祖师爷，自己就没有遵守自己的主张。有人为尊者讳，否认孔子“诛少正卯”事。我们无法起孔子与少正卯于地下，虽无法证实此事，但也很难否认此事，因为这毕竟是距孔子不远的汉人所记。

后因政见不为所用，孔子“去鲁，斥乎齐，逐乎宋、卫，困于陈、蔡之间”。在卫时，孔子不惜放下身段，屈己以见卫灵公夫人南子，想走夫人路线，借助南子说服卫灵公实行其主张。弟子子路很不高兴，孔子发誓说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不是为行道而见南子，老天爷都会厌弃我。

孔子东奔西走，周游列国，也不为各国所用。郑人骂他为“累累(不得意貌)如丧家之狗”。门人子贡如实告诉他，孔子欣然而叹曰：“然乎哉，然乎哉(是啊是啊)！”可见他也承认自己“如丧家之狗”。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孔子，是一位政治上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。

孔子“历聘诸国”未被重用后，只好返鲁。他一生特别是在晚年，做了三件大事，也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：一是兴办教育，收徒讲学，有弟子三千，七十二贤，提出了一整套的教育理论和方法。二是从事典籍整理，编成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“六经”，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。但历代对此怀疑者颇多，认为诸书早已存在，并非孔子所编，他至多只是作过一些删节而已。三是提出了一整套儒家伦理体系，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学大师们最为推崇的，尽管他们自己从未打算付诸实践，而其所作所为往往与孔子提倡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。

孔子生前就是一位有影响、有争议、毁誉参半的人物。他的弟子对他称颂毕至，如太宰赞叹说：“夫子圣者与，何其多能也！”子贡曰：“他人之贤者丘陵也，犹可逾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”颜渊赞叹孔子的学问和道德是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”。而长沮、桀溺、接舆等则讥刺他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，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

孔子死后，更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儒学遭到严重摧残。但在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之后，这位生前吃尽苦头的孔子和死后遭到秦始皇活埋的儒生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，竟取得了“独尊”的地位(这只是表面表象，详后)，而且有越来越尊的趋势。汉平帝封他为“褒成宣尼公”，唐玄宗封他为“文宣王”，宋真宗又在“文宣王”前加上了“至圣”，元成宗又在“至圣文宣王”前再加“大成”，明世宗改封为“至圣先师”，清世祖又加封他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”。但正如鲁迅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所说，统治者把他“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”，给他加上了“阔得可怕的头衔”。鲁迅如果活到现在，看到现在给他加的“救世”主头衔，也许更会感到“吓人”和“可怕”。

<sup>①</sup> 《汉书》卷七十六《王尊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3228页。

为什么历代君主如此推崇孔子？主要不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孔子的三大贡献，而是因为他提出了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。《论语·颜渊》载：“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‘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’公曰：‘善哉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？’”齐景公的回答，颇能说明历代君主“独尊儒术”的原因，如果没有这套等级制度，就很难巩固其统治：“虽有粟，吾岂得而食诸？”这说明孔子和儒学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，而是代表统治者利益的。

### 三、孔孟之道未必都是“规矩准绳”

有人说，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“规矩准绳”。孔孟之道的“仁义礼智信”是很不错的，不少至今都可作为人们的“规矩准绳”，如“和为贵”，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；强调诚信：“言而有信”，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”，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；强调言行一致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，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；强调行事谨慎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；强调师贤改过：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，“过勿惮改”，“见贤师齐焉，见不贤而自内省也”等等。但孔孟之道与任何其他学说一样，未必都可作为“规矩准绳”，如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，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等等。尽管儒学家们作了种种辩解，也都很难自圆其说。历代对孔孟之言不以为然者也大有人在。

《孟子·万章》所说的尧、舜禅让，被历代儒家传为美谈，大吹特吹。法家的韩非《五蠹》认为尧、舜禅让，没有什么值得赞赏的（“不足多也”），因为他们工作很辛劳而生活却很艰苦，住的是“茅茨不剪，彩椽不斫”，吃的是“粝粢之食，藜藿之羹”，穿的是“冬日麕裘，夏日葛衣”，连守门人的生活都不如。他以尧、舜、禹的天子生活与后世县令作对比说：“古之让天下者，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，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；今之县令，一日身死，子孙累世絮驾（有车乘），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于让也，轻辞古之天子，难去今之县令者，薄厚之实异也。”法家往往能揭示出人与人之间血淋淋的利害关系，这就是一例。明末清初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也有类似的看法。

历代还有一种看法，认为尧、舜传位不是禅让，而是废逐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竹书纪年》说：“昔尧德衰，为舜所囚。”李白《远别离》<sup>①</sup>诗也持同一观点：“尧、舜当之亦禅禹，君失臣兮龙为鱼，权归臣兮鼠变虎。或言尧幽囚，舜野死。九疑联绵皆相似，重瞳（舜，重瞳子）孤坟竟何是？”唐代刘知几认为：“舜虽废尧，仍立尧子，又夺其帝者乎？”“观近古有奸雄奋发，自号勤王，或废父而立其子，或黜兄而奉其弟，始则示相推戴，终则成其篡夺。求诸历代，往往而有。必以古方今，千载一揆。斯则尧之授舜，其事难明。谓之让国，徒虚语耳。”<sup>②</sup>

历朝皇帝夺天下，不外巧取或豪夺两种方式。所谓巧取，就是用和平的方式篡权。所谓豪夺，就是用暴力的方式夺权。一般说来，巧取与豪夺是结合并用的，以豪夺为后盾，力争巧取；巧取不成，伴之而来的就是豪夺。尧、舜的所谓禅让，就是以豪夺为后盾的禅让，甚至是把豪夺说成禅让。这种所谓禅让是我国历代夺权篡政的惯技，曹操、司马懿父子甚至迫使皇帝三跪九叩地禅让，方肯接受。

豪夺也是“替天行道”，讨伐罪孽；而欲加诸罪，何患无辞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载，齐宣王问孟子，有没有汤放桀，武王伐纣之事。孟子说有。齐宣王又问：“臣弑（杀）其君，可乎？”孟子回答得很巧妙：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谓之一夫（独夫）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“弑君”本来是不符合孔孟之道的，但诛独夫民贼，就冠冕堂皇，不失为仁义道德了。因此，不但禅让“有道”，弑君也“有道”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说：“杨子（杨朱）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。”并对其观点进行了尖锐的

① 王琦：《李太白集注》卷三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 《史通》卷十三《疑古》，四库全书本。

批判,斥之为“禽兽”：“圣王不作,诸侯放恣,处士横议。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,天下之言不归杨,则归墨。杨氏为我,是无君也;墨氏兼爱,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,是禽兽也。”但批判归批判,实际信奉杨朱之说者却很多,正如宋人吕南公《杨朱》诗所说:“战国功名尺寸劳,先生持论异吾曹。孟轲解辩承三圣,后世谁曾拔一毛?”这是对杨朱、孟轲的评论,是对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利欲熏心的假儒学、假道学的辛辣讽刺。“先生”指杨朱,他力主为我,故说他“持论异吾曹”。三圣,有不同说法,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指夏禹、周公、孔子:“我亦欲正人心,息邪说,距诋(僻颇)行,放淫(邪恶)辞,以承三圣者。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”孟子说得虽好,但包括孔孟之徒在内,“后世谁曾拔一毛”?

#### 四、“君子儒”与“小人儒”

孔、孟之言既非句句是真理,历代儒家更有真、假之分。孔子不愧是圣人,他生前就料到会有“小人儒”出现。《论语·雍也》载孔子戒子夏说:“女(汝,你)为君子儒,无为小人儒。”君子为儒以明道,小人为儒以炫名。孔子死后,儒学内部进一步分化,《韩非子·显学》说:“自孔子之死也……儒分为八。”历代既有被尊为醇儒、宿儒、耆儒、名儒、通儒、大儒、巨儒、硕儒、鸿儒、君子儒者,也有被斥为竖儒、庸儒、迂儒、腐儒、鄙儒、愚儒、俗儒、谀儒、陋儒、小人儒者。而笔者更愿以真、假二字区别历代儒者:君子儒是真儒学,他们真正相信并大体实行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;小人儒是伪儒学,借儒学之名以炫耀自己,贩卖私货。苏轼《荀卿论》评孔子说:“其所言者,匹夫匹妇之所共知;而所行者,圣人有所不能尽。”那些“匹夫匹妇之所共知”的孔子言论,圣人都未必能完全实行,而后世一些以“圣人”自居的伪儒学,则根本就未打算付诸实践。同文又说:“学圣人者,岂必其言之云尔哉,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。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,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。”伪儒学的特点就是不仅“不能行其说”,而且“窃其说而为不义”。他们根据时势需要,借儒学以谋私利,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口是心非、表里不一,言行不一、言不顾行、行不顾言。以其所行,衡其所言,不少鸿儒实际上是伪儒。其例举不胜举,这里仅以叔孙通为例来看看伪儒学的特点。

叔孙通,秦、汉之际薛(今山东薛城东南)人,被称为“汉家儒宗”(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》。本节所引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传)。其实,他是典型的伪儒。不根据事实说话,而根据需要说话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是伪儒学的特点之一。叔孙通在秦时以文学征召,陈胜反,秦二世诏诸儒生问该怎么办,诸生三十余人主主张“急发兵击之”,只有叔孙通说:“明主在其上,法令具于下,使人人奉职,四方辐辏,安敢有反者?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,何足置之齿牙间?”这位秦臣叔孙通,置秦命运于不顾,所说完全是违背事实的阿谀奉承的话。秦二世听了很高兴,又尽问诸生,诸生或言反,或言盗。结果言反者被捕,言盗者有赏。叔孙通出宫后,诸生指责他:“先生何言之谀也!”叔孙通回答说:“公不知也。我几不脱于虎口。”并马上逃离秦国。从个人利害关系看,不得不佩服叔孙通比那三十多个儒生聪明;但从人品看,叔孙通与孔子“贫而无谄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的主张则完全背道而驰。

逃离秦国后,叔孙通先追随项梁;梁败,又追随义帝;义帝被项羽杀害,又事项羽;羽为刘邦所败,又降刘邦。其所作所为,堪与五代时的冯道媲美。“叔孙通儒服,汉王憎之,乃变其服,服短衣,楚制,汉王喜。”何为伪儒?这就是伪儒,《论语·里仁》反对“放(依)于利而行”,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;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”。而叔孙通为讨好刘邦,不惜脱掉儒服,穿上楚制短衣,这完全是依利而行。一涉及利害关系,伪儒就只要利,是根本不管“儒”不“儒”的。

汉五年(前202),刘邦已并天下,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,征鲁儒生三十余人,为汉制礼作乐,叔孙通欣然而往,为诸生“市利”。鲁有两位儒生不肯行,曰:“公所事者且十主,皆面谀以得亲贵。今天下初定,死者未葬,伤者未起,又欲起礼乐。礼乐所由起,积德百年而后可行也,吾不忍为公所为。公所为不合古,吾不行。公往矣,无污我。”这是对伪儒叔孙通的深刻揭露。叔孙通笑曰:“若(你们)真

鄙儒也，不知时变。”鄙儒“不知时变”，叔孙通则善随“时变”，善于根据时势需要说假话，不顾“死者未葬，伤者未起”而粉饰太平，以谋取高官厚禄。但世上还是有好人，仍有宁为“鄙儒”而不为伪儒的儒者。

高祖崩，惠帝即位，为长乐宫，作复道，经过宗庙。叔孙通说，陛下为什么筑复道于高祖庙前？惠帝大惧，要立即废复道。叔孙通说：“人主无过举。今已作，百姓皆知之。今坏此，则示有过举。”这完全违背《论语》所说的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”。难怪司马迁辛辣地讽刺叔孙通“希世度物”，“与时变化”，“大直若拙，道固委蛇”。宋人刘才邵《叔孙通论》说，叔孙通当时应“请宣布帝意，亟罢其役，俾臣民晓然知之”。如果刘才邵与叔孙通同时，恐怕又会被他讥为“真鄙儒也”。叔孙通比刘才邵聪明得多，这既符合惠帝的内心愿望，自己也可沾光享受，他不可能教惠帝闻过而改，只会教他文过饰非。

## 五、中国历代从未“独尊儒术”

有人说，没有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“就不会有灿烂的中国文化”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，是在弘扬中国文化，还是在摧残中国文化？汉武帝真的“独尊”过“儒术”吗？中国哪个朝代的皇帝真正“独尊”过“儒术”？

孔子的儒学只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，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更遭到严重摧残。汉初诸帝多不信儒。汉高祖忙于平定四海，没有时间复兴儒学；汉惠帝、吕后所用多武功之臣；汉文帝好刑名之言；汉景帝好黄老之学。《史记·酈生陆贾列传》载：“沛公（刘邦）不好儒，诸客冠儒冠来者，沛公辄解其冠，溲溺其中（洒尿于儒冠中）。”这颇能代表汉初诸帝对儒生和儒学的态度。

直至汉武帝时的董仲舒，为汉武帝巩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出谋划策，才在《对策》中说：“诸不在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；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”<sup>①</sup>武帝从之。这并不是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创造发明，只不过是秦始皇采纳法家李斯“别黑白而定一尊”，独尊法家的反面翻版而已。

但这“独尊儒术”不过是表面现象。中国历代皇帝都是外儒内法，表面上尊崇儒家，大讲仁义道德；实际上尊崇法家，大搞严刑峻法。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独尊过什么儒术。汉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但他实际上重用的是杜周、张汤、桑弘羊等法家人物，内行集权，外攘四夷；而儒学大师董仲舒，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江都相，后来因言灾异还把他下狱，差点儿杀他的头。这充分说明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是假，外儒内法才是真。

在汉武帝招揽儒者，声称他“欲施仁义”之时，他的一位心直口快的大臣汲黯曾当面戳穿了他的假面具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”弄得汉武帝怒不可遏，“变色而罢朝”<sup>②</sup>。

汉武帝的后代对此心领神会，同样是外儒内法，也没有“独尊儒术”。汉宣帝“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”，大臣杨晖、盖宽饶都因讥刺之罪被诛。他的太子（即后来的汉元帝）劝他说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宣帝大怒道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！”（《汉书·元帝纪》）“本以霸王道杂之”，这就是汉家制度，也是中国历代的制度。汉宣帝不打自招地供出了历史的真相，把“独尊儒术”的画皮完全撕掉了。

就汉武帝个人而言，他真正信奉的不是儒教儒术，而是巫教巫术。杨亿的《汉武》诗对“武帝求仙，徒费心力，用兵不胜其骄，而于人才之地不加意”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三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。巫

① 荀悦：《前汉纪》卷十一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 《史记》卷一二〇《汲黯列传》，四库全书本。

蛊之祸是汉武帝信奉巫教巫术的集中表现。谗臣江充与太子有矛盾，诬告太子埋木人诅咒武帝。太子矫诏杀江充，长安大乱，言太子反。武帝发兵围太子，父子战于京师，死者数万人，太子自缢而死。武帝后来知其无辜，为筑思子台。前人有不少咏思子台的诗赋，诗如白居易《思子台有感二首》<sup>①</sup>，自注说：“凡题思子台者皆罪江充。予观祸胎不独在此，偶以二绝句辩之。”诗有“但以恩情生隙罅，何人不解作江充”，“但使武皇心似烛，江充不敢作江充”句，意思是说巫蛊之祸的责任主要不在江充，而在武帝自己。赋如苏过奉父苏轼之命所作的《思子台赋》<sup>②</sup>，痛斥汉武帝“多忌”、“好杀”，把左右的人都当成敌人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巫蛊之祸。苏过说，汉武帝害死了太子，就“慷慨悲歌，泣涕踌躇”，而他杀了那样多的大臣、忠臣，“皆以无罪而夷灭，一言以就诛，曾无兴哀于既往，一洗其无辜”。苏过之所以在《思子台赋》中大动感情，显然寓有父亲忠而被谤，远谪岭南的隐痛。

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几乎被历代皇帝奉为国策。但也像汉武帝一样，从来没有哪朝皇帝独尊过儒术，而是并用诸术，只要对巩固统治有利。老子姓李名耳，故唐高宗以老子为李氏祖先，尊为太上玄元皇帝。唐玄宗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为真经。宋代儒、释、道三教并崇，宋真宗、宋徽宗对道教的尊崇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宋代道士常崇道说：“非道教无以升君子，非释教无以化下愚，非儒教无以理国家。”<sup>③</sup>由此可见，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！

## 六、法家多以儒学为招牌

在儒学史上，荀子取得了与孟子相近的地位。孟子多师孔子之意，故后世以孔孟之道为儒家思想的代表；荀子多与孔子之说不同，后世虽称他为儒学大家，但实际上已是儒学中的“异说”，他培养出了焚书坑儒的大法家李斯。苏轼《荀卿论》说：“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，既而焚灭其书，大变古先圣王之法，于其师之道，不啻若寇仇。及今观荀卿之书，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，皆出于荀卿，而不足怪也。荀卿者，喜为异说而不让，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。其言愚人之所惊，小人之所喜也。”接着举例说明荀卿的“喜为异说”、“敢为高论”的种种表现：“子思、孟轲，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。荀卿独曰：‘乱天下者，子思、孟轲也。’”“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，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，荀卿独曰：‘人性恶。桀、纣，性也；尧、舜，伪也。’”苏轼认为，李斯助秦为虐，都是由其师荀卿发之：“荀卿明王道，述礼乐，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，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。”

从荀卿“明王道，述礼乐”看，他仍属儒学；从李斯“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”<sup>④</sup>看，荀卿之术已不是什么儒术，而是帝王之术，即如何夺权固位的权术。荀子讲术的地方很多：“持宠处位，终身不厌之术；擅宠于万乘之国，必无后患之术”（《荀子·仲尼》），就纯是权术。《宋史·徐谊传》说：“三代圣人至诚而无权术。”伪儒学恰恰相反，有“权术”而无“至诚”，以诈待人，把别人都当成可供他们利用的工具。权术与儒家所提倡的“至诚”是完全对立的，

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所载李斯的所作所为，可谓与儒学毫不相干：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，见吏舍厕中老鼠食粪，而仓中老鼠食粟。李斯感叹说：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。”在他看来，“贤不肖”的区别就是处于仓中还是处于厕中的区别。

李斯根据他少时已经悟到的仓鼠、厕鼠理论，认为事楚国或六国只能成厕鼠，只有事秦国才能作仓鼠。他入秦时，辞别荀子说：“诟莫大于卑贱，而悲莫甚于穷困……故斯将西说秦王矣。”《史记》未载荀子对李斯告别时的态度，可能是同意的或默认的吧。

① 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二十五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 吕祖谦：《宋文鉴》卷十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③ 《天庆观石幢题记》，《柳风堂拓片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。

④ 《史记》卷八十七《李斯列传》。

李斯到秦后,首先投靠秦相吕不韦,并向秦王献统一六国之策:“秦王乃拜斯为长史,听其计,阴谋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。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,厚遗结之;不肯者,利剑刺之。”

秦宗室大臣请下逐客令,李斯也在被逐之列,李斯上了著名的《谏逐客书》。此书打动了秦王,秦王于是废逐客令,复李斯官,用其计谋,统一了天下,自称始皇帝,而以李斯为丞相,成了真正的硕鼠。

秦始皇死,李斯又与赵高合谋,杀始皇长子扶苏,立幼子胡亥,最后又被赵高所谗杀,夷三族。李斯临死对其子感叹道:“吾欲与若(你)复牵黄犬,俱出上蔡(今属河南,斯为上蔡人)东门逐狡兔,岂可得乎?”韦庄《题李斯传》说:“蜀魄(古蜀帝杜宇)湘魂(舜帝)万古悲,未悲秦相死秦时。临刑莫恨仓中鼠,上蔡东门去自迟。”

从李斯事秦的所作所为看,确实都是夺位固位的权术,而这都是他从荀卿处学来的。李斯的所作所为当然不能全由荀子负责,因为他未听从其师的忠告。如《荀子·议兵》篇载,李斯认为秦的强胜不是靠仁义,而是靠“便从事”,只要便于从事,可以不择手段。荀子反驳说,李斯所谓“便”是“不便之便”,而“仁义”才是“大便之便”。看来李斯并未听从荀子之言。只有在吹捧秦始皇的暴政时,他才想起儒学字眼,称美秦始皇“忧恤黔首,朝夕不懈”,“男乐其畴,女修其业”,“黔首安宁”,“莫不得意”<sup>①</sup>。

## 七、篡权夺位者多以儒学相粉饰

孔孟之道、儒家学说产生后,就被各色人等所利用。《庄子·胠篋》说:“跖(古代大盗)之徒问于跖曰:‘盗亦有道乎?’跖曰:‘何适而无有道耶?夫妄意室中之藏,圣也;入先,勇也;出后,义也;知可否,知也;分均,仁也。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,天下未之有也。’”“盗亦有道”,这是庄子颇富哲理的名言。圣、勇、义、知、仁等等,都是儒家的信条,却被历代大大小小的强盗,从窃钩的小偷,到拦路抢劫、杀人越货的绿林豪杰,一直到窃国篡政的王侯将相夺去了,他们没有一个不是“满口仁义道德”的。

一提起王莽,大家都知道他是篡汉自立者,是短命的新王朝(8—23)的建立者,恐怕未必所有人都知道他也是一位伪儒。翻翻长达上、中、下三卷的《汉书·王莽传》(本节所引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传),就不难发现他动辄以“六经”、孔孟之言为据,借“六经”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以文其奸言奸行。班固称王莽“色取仁而行违”,“诵六艺以文奸行”,可谓深中王莽的要害,也是所有伪儒的共同特点。

王莽为汉元帝皇后之侄,皇后之父及兄皆封侯,独莽父早死,未封侯。莽少孤贫,于是折节读书,“被服如儒生”。世父王凤病,莽侍疾尝药,蓬首垢面,不解衣带者累月。凤临死,托太后及元帝,拜莽为黄门郎。诸名士皆言莽贤,永始元年(前15)封为新都侯。爵位越尊,越恭俭礼让,礼贤下士,所得赏赐悉以享士。母病,公卿列侯的夫人去问候,莽妻出迎,布衣仅蔽膝,误以为是女仆,知其为王莽夫人,皆大惊。

成帝崩,哀帝即位,王莽以退为进,上疏辞位,换得的是升为给事中,礼如三公。哀帝崩,年仅九岁的平帝即位,王莽控制了全部军政大权。对王莽来说,没有朋友,只有有用的人。大司徒孔光为名臣,声誉颇高,对他还有用,于是尊事光。对他没有用的人,特别是对他有威胁的人,他就胁持上下尽逐之。附己者擢拔,忤己者诛逐,这就是他的用人原则。大司马董贤、成帝赵皇后、哀帝傅皇后均被迫自杀。

王莽想谋私,总要绞尽脑汁,用尽心机,多从正面略露其意,党羽就承其指意奏请,自己却坚决推让,上以欺太后,下以惑百姓。如暗示益州令献白雉,群臣力陈莽有定国安汉之功,宜赐号安汉公,莽再三固辞而后受。又暗示公卿奏言,以皇帝年幼,太后年老,诸事皆决于莽。泉陵侯刘庆上言:“周成

<sup>①</sup> 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,四库全书本。

王幼，少称孺子，周公居摄。今帝富于春秋（年幼），宜令安汉公如周公，行天子事。”后就以“假皇帝”、“摄皇帝”自居。平帝崩，他故意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帝。孺子婴四年（前9），他认为时机已成熟，干脆废婴自立，改国号为“新”，由“假皇帝”变成了真皇帝，完成了篡汉自立的最后一道工序。

王莽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，收买士心，乃大兴儒学，增博士员，网罗天下之士千余人。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说：“平帝时，王莽秉政，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，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。”其“独尊儒术”，超过前汉诸帝。

王莽还根据儒家经典《周礼》，复古改制，妄图恢复井田制，改全国民田为“王田”，不得买卖；又改革官制、官名，十分繁杂，连官吏自己都记不清楚；加强盐、铁、酒、铸钱的官营，不断改革币制，把汉武帝以后通行的五铢钱先后改为大钱、契刀、错刀、小钱、宝货等新币，造成严重的货币混乱；他收回汉王朝发给各少数民族的印绶，改授新王朝的印绶，把匈奴单于改名为“降奴单于”，把高句丽（朝鲜）改为“下句丽”；为制造舆论，他颁布《符命》四十二篇于天下，大旨无非是说汉朝命数已尽，当传位于新。王莽不仅“诵六艺以文奸行”，而且借当时流行的符瑞来证明“传于新室”乃是天意。

王莽托古改制的倒行逆施，激起各地反抗，其中包括刘氏后裔。昆阳之战，刘秀大败王莽军主力，决定了王莽政权的跨台，王莽狼狈逃入渐台，为商人杜昊所杀。《汉书》称王莽“不仁而有佞邪之材”，其实伪儒多“不仁”，所作所为实际是违背孔孟之道的；但你不得不承认他们“有材”，尽管是“佞邪之材”。白居易《放言五首》<sup>①</sup>之一说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假使当时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”王莽如果死在篡位以前，人们或许会认为他是真儒，谁还能弄清他的“一生真伪”？乾隆皇帝喜欢翻案，作《反白乐天放言句》<sup>②</sup>说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即使当时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人知。”假的就是假的，即使他死于篡位之前，恐怕也难掩其“一生真伪”。

## 八、“中国是儒学的”吗？

有人说“儒学是中国的”，这自然不错，因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、孟子都是中国人；但又说“中国是儒学的”，这就不对了，难道中国只有儒学吗？

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多样性，儒学只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，尽管是显学，但当时的显学也远不止儒学一家：以老子、庄子为代表的道家，以商鞅、韩非为代表的法家，以孙武、孙臆为代表的兵家，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，当时地位之显赫都不亚于儒家。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没有留下什么著作。有人把《论语》说成是孔子著作是不对的，《论语》只不过是他的门弟子记录他的言行的语录，思想是孔子的，著作权不属于孔子。把《论语》与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孙子》相比较，其理论的深刻性、系统性都远远逊色。特别是《老子》，是一位饱经风霜、深于世故的老人的经验之谈，揭示了人世间的复杂关系，比《论语》所载的孔子所有语录都深刻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说：“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（指《老子》上下篇），薄仁义，非礼学，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《五经》，自汉文、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。”

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儒教即使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，也未能取代或完全取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，就在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后不久，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道教，佛教也从印度传入中国。

道教源于中国远古的巫术和两汉时的神仙方术，起于战国，兴盛于两汉。黄老道是道教的雏型。他们信奉黄帝和老子。在东汉顺帝汉安元年（142），张道陵创立了奉老子为教祖（太上老君）的五斗米道，以《老子》为他们的主要经典，这是道教定型的开始。东汉末的张角，信奉黄老道，甚至建立了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。东晋葛洪撰《抱朴子·内篇》，整理并阐述了较为系统的道教理论。

① 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十五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 《御制诗初集》卷十八，四库全书本。



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都相继传入中国,其中尤以佛教影响最大。佛教自东汉(一说自西汉)已传入中国,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行,梁武帝不仅大建佛寺,甚至三次舍身入寺。到隋唐时还形成了天台、华严、净土、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。唐代玄奘虽曾正式表请赴印取经,但未蒙许可,后私自随商人赴印,历尽千辛万苦,于贞观十九年(645)返回,始得唐太宗召见,并要玄奘翻译佛教经典。到宋代才出现了由政府派遣或资助的大规模的赴印取经。宋太祖曾派继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法。后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上言,愿至西域求佛法,诏许之,并赐钱三万。非政府派遣的宋僧个人赴印取经,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。淳化四年(993)诏西边诸郡,梵僧来,中国僧西游而还者,所持梵经并先具奏,封题进上。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罗梵经,又表明梵僧来中国及中国僧西游而还者一定很多,因为政府不可能为个别僧人下此诏令。印度僧人来华者也很多。《宋史》卷四九〇《天竺传》说:“开宝后,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。”现在有人只讲儒家文化对中国及其周边邻国的影响,其实已经中国化的佛教对邻国的影响并不亚于儒教,特别是东南亚一带,至今仍是信奉佛教为主。

伊斯兰教在中国旧称回教或清真教,以《古兰经》为经典。7世纪开始传入中国,因为他们居住分散,几乎遍及全国,各地多有清真寺、清真餐馆就是明证。

基督教,有天主教、正教、新教等不同教派,以《旧约全书》、《新约全书》为圣经。早在唐初就传入中国,被称为景教,以后时断时续,特别是鸦片战争后,其中新教一派更为流行,现在信奉者也不少。

中国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点,共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,满、蒙、回、藏等等,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儒教影响,但又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民俗文化特点,不是儒学所能完全包括或替代的。如傣族最盛大的节日泼水节,云南、贵州等地彝族的火把节之类。

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,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地域文化。古代有所谓巴蜀文化、楚文化、吴越文化,根据考古发现,它们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存在了,当时孔子还未出生,儒学还未出现,也是儒家文化吗?有人引殷墟甲骨文有“儒”、“丘儒”之官,《周礼》有“师儒”之职,证明“儒者在殷商时期就已发挥着重要作用”。这里的儒是指古代的巫、史、祝、卜,与孔儒之“儒”毫不相干。

中国有数以千计的姓氏,不是一部《百家姓》所能包括的。报载有一个村只有四千多人,就有一百多个姓。君子之泽,五世而斩,但也有一些大姓连绵不断,如五代吴越王钱鏐开始的吴越钱氏,一千多年来代有名人,直至现在,吴越钱氏后裔在政治界、科技界、文学界都有不少名人。不同的宗族有不同的文化,它们受儒家思想影响尤深,但又不是儒家文化所能完全包括的,否则就没有宗族文化了。

现在有人宣扬“中国是儒学的”,但事实是儒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,即使是最重要的一部分,也不能取代或完全取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。

## 九、“反礼教”者往往因为“太相信礼教”

反对提倡或变相提倡“独尊儒术”,特别是揭露“伪孔学”、“伪儒学”、“伪道学”,难免被扣上反孔、反儒的帽子。其实,有些反孔、反儒的人,也许才是孔学、儒学的真正维护者,他们因为看不惯伪孔学、伪儒学才说一些反对孔学、儒学的话。道家学派的庄子也许正是这样的人,正如苏轼《庄子祠堂记》所说,庄子“作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胠箧》,以诋訾孔子之徒,以明老子之术。此知庄子之粗者。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……庄子之言,皆实予而文不予,阳挤而阴助之”<sup>①</sup>。苏轼认为,庄子不但没有诋訾孔子,而且尊崇到极点:“其论天下道术,自墨翟、禽滑厘、彭蒙、慎到、田骈、关尹、老聃之徒,以至于其身,皆以为一家,而孔子不与,其尊之也至矣。”庄子所“诋訾”的不是孔子,而是“孔子之徒”,即那些伪

<sup>①</sup> 《苏轼文集》卷十一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,第347页。

孔学。

嵇康与山涛为友，山涛由选曹郎迁大将军从事中郎，举康自代。康撰《与山巨源(涛)绝交书》，以“七不堪，二甚不可”予以拒绝，其中一条是“非汤、武而薄周、孔”，为“世教所不容”。其实，嵇康所“非”所“薄”，并非真正的汤、武、周、孔，而是伪礼教。正如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所说：“嵇(康)、阮(籍)的罪名，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。但据我个人的意见，这判断是错误的。魏晋时代，崇奉礼教者看来似乎不错，而实在是毁坏礼教，不信礼教的。表面上毁坏礼教者，实则倒是承认礼教，太相信礼教。”

明人李贽反对迷信孔教，反对“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，故未尝有是非”<sup>①</sup>。但正如焦竑《藏书序》(《藏书》卷首)所说：“实本人情，切物理，一一当实不虚，盖一被容接，未有不爽然自失者。”

## 十、千年未编《儒藏》之因

一千年多前的唐代，就编了《大藏经》、《道藏》，却无人编《儒藏》。明人孙鹏初、曹学佺，清人周永年均拟编《儒藏》，迄未编成。现在有多所大学在编《儒藏》，2003年6月23日的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了著名学者来新夏的《新编“儒藏”三疑》，其中一疑为“儒藏”编纂前无古人的说法。笔者还有一疑，为什么一千多年来无人编《儒藏》，或有人想编而终未编成呢？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“儒藏”早已多如牛毛，只是未以《儒藏》名书罢了。最早编“儒藏”的正是孔子，传说由他整理编纂的“六经”实际就是“儒藏”，今天无论谁编《儒藏》，恐怕首先要收的就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。汉以后编的无其名而有其实的“儒藏”更不可胜计，石刻“儒藏”有东汉的《熹平石经》，曹魏的《正始石经》，中唐的《开成石经》，五代孟蜀的《蜀石经》；纸本“儒藏”尤多，自唐孔颖达等编纂《五经正义》后，历代刊刻的五经、九经、十三经不可胜计。来新夏先生说：“清政府也为体现其盛世修典的文化一统，决定于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开馆编纂《四库全书》。这是一部以儒家经典为主体，囊括古今一切主要著述，并涵盖佛、道典籍的巨型丛书，完成了二百年来儒生呼吁编纂‘儒藏’的意愿。《四库全书》虽无‘儒藏’之名，但有‘儒藏’之实……不失为一部像样的《儒藏》。”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无人编《儒藏》的原因吧，因为无其名而有其实的《儒藏》远比佛、道二藏多得多。“涵盖佛、道典籍”也无碍它成为“像样的《儒藏》”，因为佛、道二藏也收有不少儒家典籍。

如果把中国古代文化比喻为灿烂的星空，那么，儒家文化则是一颗明亮闪烁的巨星，但它绝不是星空本身。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在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图书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但它仍只是“百家争鸣”中的一家。法家想“别黑白而定一尊”，儒家想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但都未做到，也不可能做到，因为各种学说是互为补充的，而不能相互取代。儒家学说与中国古代各种学说一样，都既有其“合理”的内核，也有历史的局限，我们需要弘扬的是整个中国传统优秀文化，而不仅仅是儒家文化；我们需要提倡“百家争鸣”，而不是独尊某术。

[责任编辑 刘培]

<sup>①</sup> 《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1页。